

很难说博尔赫斯看懂了《红楼梦》，他感兴趣的，是太虚幻境的“幻境”部分，那种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想象方式是博尔赫斯尤为着迷的。

这是在做梦，而且直到做梦人醒来，我们都认为它们是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最后使用过一次，或连续两次使用过这个手法）。有大量的幻想：中国文学不了解‘幻想文学’，因为所有的文学，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是幻想的。”

很难说博尔赫斯看懂了《红楼梦》，他感兴趣的，是太虚幻境的“幻境”部分，那种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想象方式是博尔赫斯尤为着迷的。因而，他对《聊斋志异》非常感兴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他编选过一本《聊斋志异选》，他翻译了其中的几篇聊斋故事，由英文转译为西班牙文，并为译本撰写了序言。译本为从翟理斯1880的英译本《聊斋志异选》转译，博尔赫斯在序言中有关《聊斋》的评介主要来自翟理斯原本的序言，将《聊斋》与《一千零一夜》相提并论；不过翟理斯称蒲松龄的讽喻“在西方只有卡莱尔的风格可与之相比”，博尔赫斯则以写出了《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替换了卡莱尔（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散文家、讽刺

作家），说蒲松龄“更让人想起斯威夫特”，这两位西方作家，与蒲松龄联系在一起好像都有点牵强。正如博尔赫斯在评论《水浒传》时，说《水浒传》的某些描写与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接近。

在博尔赫斯对中国的阅读中，这是最重要的两本书，正是这两部著作使博尔赫斯产生了“身在中国”的感觉。博尔赫读书很杂。英国前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翟理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对其影响尤深。博尔赫斯对《道德经》钻研也很深，他说：“我多次读过《道德经》的许多种译本。我认为阿瑟·韦利的译本最好，但我也读过卫礼贤的译本和法文译本及几种西班牙文译本。”

他还读过《易经》《庄子》以及乔治·马戈里埃编法文版的《中国散文选》，甚至读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他还为西班牙文版《易经》作序，显然，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文学。

他与中国哲学、文学的碰撞，在异域生出了奇妙的文学之花，

他的名篇《曲径分岔的花园》，很明显就有中国园林的影子，连主人公都是个中国人，让这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中国通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阿根廷与中国的奇缘。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梅赛德斯·朱弗雷朱弗雷说：“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曲径分岔的花园》中就充满了中国元素。除了主人公是中国人之外，故事也在一座‘曲径分岔’的中式花园中展开。此外，这篇小说的世界观和情节设置也明显受到了《易经》和《红楼梦》的影响。”

1985年秋天，博尔赫斯移居瑞士，在女友玛丽亚·儿玉的陪伴下养病，“计划着去中国的旅行”，第二年，博尔赫斯和他小38岁的儿玉登记结婚，并在两个半月后安然告别人世。儿玉也就在结婚两个月后成为了博尔赫斯的遗孀。

1999年，《博尔赫斯全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玛丽亚·儿玉带着博尔赫斯的遗愿来华参加首发式，还游览了故宫。博尔赫斯的遗愿由他夫人完成，何尝不是比较完满的结局？而自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于198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6年后，博尔赫斯的作品也自此开始全面译介到中国，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也开始越来越全面了。■